

台湾地区选举文化的特性研究

吴伟金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选举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目前,我国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存在诸多弊病,如悲情牌、省籍族群牌、贿选、黑道参政、蓝绿阵营极端对立等。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也有自己特色的一面,诸如“创意口号”、“强力宣传”、“积极动员参与”等。台湾地区选举文化中的劣质因素不利于实现台湾的政治稳定。随着台湾地区政治社会化水平的提高,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将朝着良性变迁的方向发展,台湾民众在选举中将变得更加理性而非盲目,候选人也将更加职业化。

关键词: 台湾; 选举文化; 政治文化

中图分类号: D61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6269(2014)03-0034-05

选举文化是政治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何为政治文化?阿尔蒙德认为,政治文化是指“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路辛·派伊则认为,“政治文化乃是人们对政治行动感觉、认知、评价和情感等取向的总体模式”。不同的学者对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界定,但其实都大同小异,只是各自定义的侧重点不同。较突出的是,阿尔蒙德把政治文化界定为“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的“三要素说”。在现代民主政治运作过程中,选举是选民表达利益诉求的工具。选民通过选票选举自己所偏好的候选人。该候选人一旦当选,将出台对选民有利的政策回馈选民。选民在选举投票时深受政治文化影响,即受自己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评价的影响。选民在选举

投票过程中会形成一种选举文化,这种选举文化对政治选举结果有着重要影响。因此,从一个地区的选举文化入手,便能窥探这个地区的政治文化构成特性。

在我国台湾地区的民主政治转型过程中,选举起了重要作用。2000年,民进党借助选举工具使自己上台“执政”,在台湾地区首次实现了政党轮替。2008年,国民党借助选举工具重新上台“执政”,并在2012年大选中再次获胜而继续“执政”。选举成为台湾政治运作过程中的关键一环,为台湾地区政党轮替上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台湾的主要政党为了实现“执政”梦想、掌握政治资源,都在选举这一关键环节中施展各自的“招数”:从民进党大打“悲情牌”到国民党调整“大陆政策”,从选举双方“曝出假丑闻打击政治对手”到“选

收稿日期: 2013-11-25

作者简介: 吴伟金(1991-),男,江西赣州人,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台湾政治研究。

举暴力”。台湾地区在政治选举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选举文化，并深深根植于台湾的政治文化之中。因此，分析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将为我们更好解读台湾地区的政治文化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一、影响选举文化的因素分析

选举文化体现在选举过程中，不同的政治体系有不同的选举文化。选举文化主要受政治文化、传统文化、选举制度等因素的影响。

政治文化是影响选举文化最重要的因素。选民的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评价直接影响选民的投票行为。候选人的政党认同、个人形象、公共政策倾向极受他们重视。在两极分化的政治文化中，中间选民力量较小，而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选民力量处于对抗状态。在这种政治文化中，左和右的势力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会为了反对而反对，对于与自己不同的立场都持异议。因此，在两极分化的政治文化中，选举的对抗性会表现得更加激烈。参选的两派势力会极力扩大各自的分歧，给对手贴上不利选举的标签，以标榜自己的特殊性和正当性，吸引选民，达到自己胜选目的。与此相反，在高度一致的政治文化中，极端左翼和极端右翼力量都非常弱小。在选举中，政党及其候选人会以比较温和、偏向中间的政策来吸引中间选民。传统文化是影响选举文化的另一个重要因素。传统文化的积淀、传统心理特征、特殊的人际关系网络和独特的行为方式对选民的投票倾向和选举文化产生深刻影响^[2]。在传统文化盛行的地区，选举中往往存在“铁票”现象。这一现象表现为以“亲族”为中心形成的人际关系圈。

此外，选举制度也会影响选举文化。制度主义者认为，制度的形成会影响个人偏好，个人为了从制度中获取最大的利益就会去顺从制度或反对制度，个人行为深受制度影响和制约。选举制度影响着选民和候选人的偏好，形

成独特的选举文化。在复数选区单记不可让渡投票制的选举地区，一个选区有多个议席，每位选民只能投一票给一个候选人，票数投给候选人，议席则根据选票多寡决定。因此，政党往往会采取配票策略来实现席位最大化，但是这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党内同室操戈大于党际竞争、政党派系取代政党地位、候选人好走偏锋等情况。

当然，影响选举文化的因素不仅仅局限于此，还有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因素。经济发展水平越高，政治竞选的经费就越多，形式就更加丰富多彩。

二、台湾地区选举文化分析

（一）悲情牌

悲情牌是指在选举中政党及其候选人以受政治迫害、疾病、被暴力胁迫等历史或新闻事件作为诉求，争取选民投下同情选票。悲情牌可以创造出由谷底绝处反弹的奇迹，利用选民情绪化的反应让选票极大化。台湾的政治文化中普遍存在着“悲情意识”，这已经是学者们的共识。台湾政治文化中的悲情意识源于台湾民众历史的“不愉快记忆”——他们无法当家作主和掌握自己的命运。长期的压抑使台湾民众有着“出头天”的强烈愿望。当台湾实现民主选举之后，悲情牌便成了台湾选举中吸引选票的有利工具。

台湾地区选举中的悲情牌成为赢取选票的重要策略。台湾地区开始推行民主选举的时候，民进党的候选人往往打着被政治迫害的悲情牌而屡试不爽。只要参选人打着因反抗国民党专制统治而被判过刑、住过监狱的旗帜，同情票就会滚滚而来。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前，就一直把因交通意外致残的吴淑珍打造成“国民党政治迫害的牺牲品”以换取悲情支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后的陈水扁更是每每在危急时刻祭出“悲情利器”。2004年，陈水扁在民调远远落后的情况下，凭借“两颗

子弹”瞬间煽起了部分选民疯狂的悲情，进而改变选举结果而“赢得”选举。这成为陈水扁玩弄政治悲情的“经典之作”。

（二）省籍族群牌

在台湾地区选举文化中，族群的对立与撕裂对台湾社会的伤害最大。族群问题在李登辉当政期间就已经凸显。李登辉当年正是依靠制造和利用本省人和外省人的族群矛盾，巩固了自己的权力，打击了国民党内的“非主流”派。民进党更是将族群问题发挥到了极致。在民进党的政治话语里，“外省人=国民党=亲中=不爱台湾”，“本省人=民进党=爱台湾”。民进党借着“反中”招牌，挑起族群矛盾，打压泛蓝阵营。民进党在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过程中，再次打着省籍族群牌，进一步加深了台湾社会的族群对立，使台湾社会又经历了一次分裂。

族群牌有其特定的历史需要。在台湾选举中，由于中间选民少，选民被撕裂为统独、本省人和外省人的选项。族群牌虽是最低廉最有效的宣传动员口号，但是一种不成熟的民主选举方式。相比于族群，公共政策对候选人来说显得不那么重要。这是台湾社会长期以来劣质选举文化对政治稳定产生的不利影响。

（三）贿选与黑道渗透政治

台湾地区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还保留了相当程度的传统文化。关系、面子等人情关系法则在选举中时常出现。有学者指出，人情关系是人与人交往过程中用来馈赠对方的一种资源。在台湾社会中，人情关系法则的强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众对选举文化的认知。例如，对于台湾选举中存在的“买票”现象，很多人并不理解为贿选，而是理解为人情之间的往来和面子交换。买票行为不仅具有政治内涵，而且符合岛内的人情风俗习惯。当然，由于直接行贿、买票是违法的，为了不被人抓到把柄，参选者们想出了很多办法和花样，岛内

舆论称之为“改良式贿选”。请客吃饭是“改良式贿选”的一种方式，已经成为一种习俗。为了吸引选民参与，有的还附带进行“摸彩”抽奖。候选人此时调动自己所有关系，利用同乡会、同学会、宗亲会等社团组织，广邀朋友参加。这种吃饭又叫“拜票”，遇到有实力的候选人，“拜票”一摆就是几十桌、上百桌。候选人披红挂彩，向来宾一一敬酒，满嘴拜托，为的是选民到时投他一票。他们还迂回买票。一般企业财团为支持其负责人或其他好友候选人当选，多半会运用庞大的员工和眷属为其助选。动员员工及其眷属为特定候选人拉票助选，最有效的办法是承诺只要该候选人当选，所有员工一律加薪。员工们为了达到加薪目的，不仅自己主动助选，还动员亲戚、朋友上阵，助选的人越来越多。选举中常看到“搓圆仔汤”现象。所谓“搓圆仔汤”就是有意角逐某项选举的人，在最后阶段突然宣布让贤。他们退出的原因往往是拿了其他候选人好处，而有意成全其他候选人。“搓圆仔汤”实质是“竞而不选”，真正目的是“待价而沽”、从中得利。

黑道渗透政治也是台湾选举文化中的痼疾之一。在台湾政坛中，“漂白”行动早已不是什么秘密。黑道势力与某些政客之间利益共生，不满足于选举拉票，而是直接参与选举，成为一些县市的官员或“议员”，甚至进入“国会殿堂”^[3]。比如，此前的屏东县“会议长”郑太吉、彰化县“议会副议长”粘仲仁等就是黑道出身；出身台北县的“天道盟”精神领袖罗福助和出身屏东县的蔡豪等多位“立委”就是被台湾舆论界点名的“黑道立委”。根据台湾媒体报道，20世纪90年代中期，台湾“中央民意代表”中5%—10%的人有黑道背景，“地方民意代表”中更有高达1/3的人有黑道背景。在2000年的台湾地区领导人选举过程中，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李

远哲曾公开指责李登辉所谓的“民主”是“黑金民主”。

当然，台湾黑道渗透政治有其社会基础。在台湾的政治制度设计中，“议员”对外开放，且作为民意代表有着分配社会资源的权力（包括重大工程的审议、决策权等）。如此，选民和“议员”可以利益共生。只要黑道“议员”当选能够给地方带来公共工程项目、增大地方利益和不直接损害地方选民利益，很多选民就会选择他们，不管所选“议员”是否和黑道有关系。此外，黑道作为一种体制外的道路，对于解决民间某些纠纷具有某种权威，能解决好某些公权力不能解决的问题。只要选民有需求，黑道“议员”就能够通过关说、暴力恐吓等手段解决选民问题。因此，台湾黑道渗透政治的选举文化暂时不会消亡，反而作为一种独特的政治文化现象继续存在。

（四）零和博弈的政党政治

在台湾选举文化中，零和博弈的政党政治的具体表现是“逢对手必反”，以各种手段击败对手而不管手段是否合情合理；选举中过于注重攻击对手，忽略选民对政纲的认同和理性讨论。有学者戏言，台湾的政党政治就是“整党政治”，即“整死反对党”。在选战中，“政党及其候选人，多数采取赶尽杀绝的方式攻击对手。最常见的是各政党及其候选人利用电视、电台、报纸、杂志、文宣资料及造势活动，以断章取义、以偏概全、造谣抹黑、揭人隐私、恶意栽赃……卑劣手段，大有非置对方于死地不可之势”^[4]。在2004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泛绿阵营提出对泛蓝阵营“割喉割到断”的血淋淋宣示。台湾选举中双方零和博弈、赤裸裸对立、为反对而反对的情况一直在上演。这表明台湾地区大多数民众的民主素养不高、社会民主化程度仍然较低。如果台湾地区持续维持现在的“整死反对党”的选举文化，那么这种“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

岛内蓝绿阵营采取不择手段的选举策略，原因在于双方对“权力”极度贪婪。各自打着“代表人民、服务台湾”的“正当性”旗号，不管手段是否合情合理，是否经过理性思考，将政策辩论抛诸脑后，自娱自乐，吸引眼球，以获取选票。

曝出丑闻也是常见的打击对手的一种方式，并利用不负责任的新闻媒体推波助澜。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的民意调查也被曝出造假丑闻。部分台湾媒体早已有政治立场，但表面上假装公正，在民意调查中“灌水”，冲高自己支持的候选人的民调，影响选民的投票决定。可信任的媒体亦曾被权力施压干扰，丧失了传媒的中立立场。选举中攻击对手容易引发口水战。有报道称，“每逢选举，台湾就好像进入了人性黑暗期。触目可见，都是候选人之间的相互指责，使人觉得所谓选贤与能，根本就是笑话”。部分言论更是演化为恶意攻击。有候选人出言不逊，在公开场合及电视节目上骂脏话，甚至通过媒体揭发对手的丑闻和隐私。比如，2012年“副领导人”候选人苏嘉全被揭祖坟建在向政府承租的农牧用地之上，其妻子洪恒珠涉嫌不当承包招标及曾观赏“猛男秀”。

（五）台湾地区选举文化的其他特色形式

台湾地区选举文化的其他特色形式包括：
1. 创意口号。选举候选人往往都会设计口号，既代表个人形象又表达政纲，令人印象深刻。陈水扁首次参选台北“市长”提出的“快乐、希望”口号，改变了传统悲情选战文化，使选战达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各方面候选人都提出了不同的创意口号，获得了选民的青睐。
2. 选举商品。在2012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大选中，两组候选人都制作了不同的商品：蔡英文开设“小英商号”，出售T恤、徽章、杯、笔记本等，更以“小猪扑满”作筹募小额经费之用，让民众自

由捐款；马英九和吴敦义则以“平安”为主轴，以“青天白日旗”为设计元素，制作了不同款式的“平安福”并发放给民众，还设计了手表、口罩、手机壳、头巾等。3.强势宣传。愈临近投票日，竞争愈激烈。各候选人的选举旗帜、海报、纸板和宣传单到处悬挂，宣传车满街跑，喇叭声震耳欲聋。对此，有些人觉得“有碍观瞻”、“太杂”、“美感太差”、“混乱又嘈杂”。不过有台湾学者指出，这是“台湾才有的选举风气，也替生活增加了不少趣味”。目前，台湾的选举文化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如旗帜不能随处悬挂，市容干净整洁了很多。除此之外，候选人更多利用了网页、社交网站、手机终端、影片等渠道进行宣传。4.频繁活动。选举前，候选人拜票、探访、集会、车队巡游、访问、政见发表、电视辩论等活动频繁。各候选人力求通过增加曝光率进行拉票，将选情升温。名人、“名嘴”都会在公开场合帮忙造势，例如在电视访谈节目中表达立场、变相助选。此外，针对不同年龄群体的助选团也是竞选的一大特色。比如，针对青年的助选团，利用青年人喜欢的明星来助选等。

三、结论

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一个地区的政治稳定取决于政治参与和政治制度之间的平衡。如果社会动员和政治参与扩大，而政治上的组织化和制度化步履蹒跚，将会引发政治动荡和骚乱^[5]。政治参与是实现政治稳定的前提之一。台湾地区的政治选举文化存在威胁台湾政治稳定的一面，也存在许多非理性成分。在台湾地区选举文化中，蓝绿阵营相互对立。双方选民的情绪性和非理性色彩浓厚，对自身阵营的认同度和政治参与热情很高甚至狂热。在选举中，这会极力压缩温和派中间选民的政治空间。我国学者李鹏指出，“在台湾所有政治势力中，‘台独基本教义派’政治参与意识最

高，‘台独’意识根深蒂固，往往在民进党选举动员的时候最先站出来，成为民进党最坚定的支持者，当陈水扁有偏离‘台独’主张的迹象时，他们的反弹也最为强烈，对民进党的施政造成很大的牵制”^[6]。这些支持者抗争的手段也最为激烈，甚至不惜使用暴力手段，是台湾政治不稳定的重要因素。选举文化中的贿选、黑道渗透政治严重影响着台湾民主化进程，与法制、民主的现代精神相背离。台湾当局虽然制定了相关法律规范来打击贿选行为，但由于贿选的隐蔽性，贿选成风现状难以改变。

尽管台湾选举文化存在诸多弊病，但随着台湾民众对选举的深入参与，它将逐步变迁，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台湾选举文化逐渐变得理性，暴力政治气氛逐渐淡化，选战中“非黑即白”的支持或反对态度已经有所缓和。二是候选人的竞选方式变得更加职业化。候选人过去的悲情牌、谩骂、极力抹黑对手、煽动情绪等选举方式，现在开始转变为宣传政纲或政策辩论。这说明台湾地区的选举文化在进步，台湾民主正逐步走向成熟。

参考文献：

- [1] [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29.
- [2] 陈星.台湾选举文化论略[J].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6,(4):19.
- [3] 刘国深.台湾政治概论[M].北京:九州出版社,2006:60.
- [4] 陈癸森.论台湾[M].台北:海峡学术出版社,2002:59.
- [5] [美]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5.
- [6] 李鹏.台湾难以实现政治稳定的政治文化根源[J].社会主义研究,2007,(3):103.

责任编辑：汪守军